

# 继承蒙古族的优良传统开展 哲学史的科学研究

石 峻

## 一、蒙古族哲学史研究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蒙古族是我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它早在秦汉以前就有文献记载，在我国历史的长期发展中，在军事、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并在世界历史上有着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如西方古代数学的经典著作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最早就是用蒙古文翻译后传入我国的。我国的“四大发明”也是经蒙古族从元代开始传入西方并从而著称于世的。当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里详细地记载了元代中国社会的高度文明，引起了西方各国的羡慕，促进了后来东西航线的开扩。在近、现代，蒙古族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一直起着积极的、重要的作用。因此，继承蒙古民族的伟大传统，开展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科学研究，对于建设我国各民族统一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十分重要的一项内容。

对于蒙古族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在国外，无论是西方或东方，都有着相当长久的历史，有关的著作也很多，其中有不少东西可以弥补我们史料的不足，特别是关于元代的。当然对这

些著作要加以分析。我们应该放眼世界，与他们相互取长补短，并敢于纠正、批判外国有关著作的错误。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并从而使我国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科学研究，走在世界蒙古学研究的前列。我们的专业工作者应该有这个信心和勇气。因为这是我们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特别是蒙古族同志的光荣责任，是可能也是应该大有作为的。

## 二、哲学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应是宽广的

哲学的范围，在古代是比较宽广的，从中国来说，同社会的政治、伦理思想等联系尤其密切。我们研究哲学史，是研究过去的哲学。如果按现在的分法把它搞得过细，对研究工作是不利的，也不大符合历史的实际，而且要真正弄清楚当时的哲学思想，离开当时的社会思想，那将是十分抽象的，甚至是无法理解的。哲学是一种高度的抽象，离开了当时实际的、具体的东西，那就很可能变为一种空洞的抽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加上社会思想史乃至科学史，把它们联系起来去理解，才能弄清过去的哲学思想及其社会意义。

通常，科学和哲学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将古代天文学、医学乃至军事学的著作，直接称为哲学的理论著作，但是通过或借助于这些著作，探索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却是必要的，可能的。这就要求我们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上来进行考察，并从中作出哲学的理论概括。我们的研究范围应该是宽广的。而且这方面的资料从现在看来是很多的，关键在于我们不能仅限于从概念出发，从寻找什么是合乎现代哲学定义的著作出发，去进行所谓的理论研究。我们应该从客观事实和思想实际出发去从事解剖。

### 三、蒙古族哲学史研究的重要特点

蒙古民族是有自己的哲学思想的。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们必然要对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不断地加以总结，在此基础上，当然会产生自己的哲学及社会思想。这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例外的。当然，有的民族的哲学社会思想，有的有书本专门记载，有的则没有或记载不完整，或虽有记载后来却散失掉了。但这只能说是保存形式的不同而已，而不是有没有哲学思想的问题，我们不能以有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来确定一个民族有没有哲学思想。就拿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孔丘来说，他本人也没有写过专门的著作，《论语》一书，便是他的弟子甚至再传弟子记录下来的他的言行，而且也不是专门讲哲学的。古代印度地方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他是现在的尼泊尔人）传说也没有写过什么书，但是现在所谓的佛教经典累计下来，有成千上万卷。我们不能因此说孔丘、释迦牟尼这些人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不值得研究。同样，从这个原则去看，蒙古民族也是有其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

与此相联系，可知研究蒙古族哲学史就不必一定要以古代某一本哲学理论著作或文献记录为唯一对象，而是应该从广泛的各种思想资料出发，去进行研究，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这应该是目前蒙古族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恩格斯利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作为我们的楷模。我们也可以通过对蒙、藏地区的社会调查，利用包括喇嘛教经卷等在内的各种资料，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撰写出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科学著作。

有关资料的整理、出版，也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我们应该有计划地培养精通古代蒙古文献的专家，以整理、发掘有关的

资料。在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中，还要注意我国和外国之间、国内民族与民族之间彼此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联系。不要把它们割裂开来，孤立地去搞。例如，佛教虽然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但是一经传入中国，就适应中国当时社会各阶层的需要而有所改造，成为有中国特点的佛教。外来的东西和国内固有的东西，往往有从相互对立到融合乃至合统的情况。二者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不可简单看待。同样，蒙古佛教和西藏佛教之间应该说也有这种类似的联系与区别，不能只看到它们形式上的共同的一面，而忽略了其它。

#### 四、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问题

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问题，就是思想性或革命性同科学性的统一问题。具体地说有三层含义：第一，要使我们的研究牢固地建立在客观历史事实和思想实际的基础上，努力做到实事求是，反对任何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第二，研究方法本身要科学。在学术研究中要逐步形成一种客观的标准，而不能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种“各取所需”的实用主义；第三，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则这种研究工作将会走上邪路，对社会主义事业不利。

具体联系我国哲学史研究的实际情况，就有关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问题，我认为应注意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一般人大都认为哲学是“文科”。这当然有一定原因，但是哲学的“文”不完全相同于纯文艺的那样一种“文”。文学艺术可以而且有必要搞浪漫主义，诗歌和戏剧尤其突出，但是哲学就不可以如此。因为唯物主义哲学是要搞实事求是的，不然就会导致宣扬唯心主义。涉及到中国哲学史，过去许多著名哲学家的“碑”、“传”，大多出自过去封建文人的手笔，并且前后相袭，只说好的不讲坏的，隐恶

扬善，“为尊者隐”，“为贤者讳”。因此对这些记载我们一定要分析、考证，不可以盲目相信那些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更不可以去模仿。对于哲学思想在历史上的影响，也要实事求是地去看，例如孟轲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果真那个时代社会上的“乱臣贼子”，就如此害怕别人议论吗？我总有点怀疑。此外，还有许多神话的东西，更不可以完全置信。我们一定要尊重事实，破除对古代书本中的记载以及有关传说的迷信。至于历史上的那些大哲学家，他们都是时代的产物，本不是什么“超人”，我们也不可以迷信。应该来一个思想上的解放。

第二个方面，要注意其他有关的一些问题。现在大家都感到资料不够用，需要大力地整理、发掘，这是一种客观的要求，是科学研究发展的标志。这确实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但是，将来即使我们有了比较丰富的资料，是否就一定做出重大的贡献呢？那也是在“两可之间”。如果指导思想不够明确，研究的方向不对头，也仍无济于事。弄不好有的人可能只成为活的“书柜子”，有的人甚至可能制造出一些更加精致的毒品来。因此，一定要很好地注意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向。万不能一味拜倒在前人的脚下，而要敢于“推陈出新”，“后来居上”，不能没有分析批判的头脑，分不清“精华”与“糟粕”，甚至把糟粕视为精华来加以宣扬。

从中国哲学史研究解放前后几十年来曲折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出发，为了反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封建复古主义乃至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以及简单化、庸俗化和实用主义，当前提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问题，是很必要的，既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谈蒙古族哲学史的研究

陶克涛

### (一)

在对蒙古族的研究领域里，史事的阐述、古地的核实、典章的考释、名物的辨证、籍录的译校、社会的剖析、经济的检讨、族系的排比、语言的论列等等，至今一直是人们恣恣然勤于用力的所在。应当承认，随着日积月累，这种辛勤是创获既称丰硕，其有益于学科的繁荣，亦人所共知。这样的成果是需要继续努力扩大的。然而在瞻顾这种繁荣的同时，亦不能不使人想到：蒙古学中的一块不小的园地，至今似乎甚少为学人所注意，这就是蒙古哲学史。学术界迄今为止所作的很不完整的有关统计中，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竟无一篇关于它的论著。国际性的蒙古学学者会议，从1959年以来已开过三次，除最后一次有人就其国家的哲学发展作了报告外，也不再见有什么消息。因此，说蒙古哲学史至今尚属荒外之区，恐怕不为过吧！“荒外”就是冷僻。蒙古学各学科满堂兴致，独独使哲学史这样一门重要学科向隅，显然是一个缺陷。蒙古哲学史的研究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我国，为改变这一状况而首先倡议蒙古族哲学史的研究并将其列入整个学术规划的，是内蒙古的哲学界。多少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心下，结合现实的与学术本身的需要，经过社会科学部门和学术界专业人员的努力，内蒙古社

会科学阵地，一扫“四人帮”时期独擅“帮”术、摧残百家那种则暗则险的影响而展现出一派生气盎然的景色。“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它不但积极地实践着为人民服务的总则，而且同时也为蒙古族哲学史的开拓创造了条件。人们已经看到，内蒙古哲学界的同志们及时地利用这些条件并依据自己所面临的情况，建立起专业机构，调配了专业人员，勤勤恳恳地致力于这一领域的探索。几年来，他们经之营之，的确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当然，工作刚刚起步，路途还很遥远，眼前从事这一工作的力量也还嫌少，然而能有意识地提出这一课题本身就已具有首创意义，能起步就了不起。“朝发轫于苍梧兮，余夕至乎悬圃”，只要有了这个“发轫”，我想，经过艰苦努力，不用很久，登上那个哲学史“悬圃”的希望，终究会实现的。张协说：“大夫不遗，来萃荒外”，我的确希望学术界的“大夫”们，不遗于此，萃萃然来共同从事这一科目的研究，使蒙古族哲学史这一园地亦如蒙古史的其他各科那样，开花，结果。蒙古族哲学史的天地是大有可为的，以为“没有油水”的论断是不妥当的。

## （二）

研究蒙古族哲学史，对于理解蒙古族历史具有肯定的意义。1834年，德国诗人海涅说：“法国人最近读了一些我们的文学作品，就以为能够理解德国了。然而他们借此只不过从完全无知的状态，刚刚上升到问题的表面。因为只要他们不理解德国宗教和哲学的意义，我们的文学作品，对他们仍是一些默默无言的花朵，整个德国思想对他们仍是一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哑谜。”蒙古的哲学史当然不能等同于德国的哲学史，甚至也不能望其项背。然而假如有人愿意遵照古书所谓“启乃心，沃朕心”的训示，从重视哲学史这个角度出发，把这位激进民主主义者的话，

加以引申而套用在蒙古民族身上，说只要不从哲学上理解蒙古史，或者说，只要不理解蒙古哲学史的意义，蒙古文学作品不过是无声的花朵，整个蒙古历史的思想依然是隔膜的，也许不是全无启沃的吧！蒙古哲学史的研究，对加深蒙古历史发展的了解大有裨益。马克思曾经提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十一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十八世纪。……但是，……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十一世纪或者十八世纪，而不出现在其它某一世纪”<sup>②</sup>，这就需要调查研究产生这些原理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根源，对于蒙古历史情况也需如此。在考察蒙古历史思想的演变时，除根本地从经济基础中去找原因外，还需要向思想本身去探溯，就是说，需要研究蒙古哲学史。从蒙古史的探讨中，人们不但有可能了解在特定历史时期蒙古人社会活动的思想渊源，从而了解到为什么有些历史经历取得了成功，而另外的活动却终告失败；而且也有可能使他们了解到某种哲学思想本身又是在什么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从而使人们有可能了解到蒙古哲学思想的连续性和与其他各民族思想的关联性。正是由于蒙古哲学史的研究，才可能有助于把握蒙古民族意识与传统的形成和特点；也正是由于蒙古哲学史的研究，才可能有助于去鉴别和扬弃历史上积累起来的那些理性的精神财富或糟粕。

赵紫阳总理在《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中指出：“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精神文明的范围很广，它的主要内容必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是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作为祖国哲学史一部分的蒙古族哲学史的研究，正是这种精神文明建设的內容之一。它有助于提高人民爱祖国、爱人民；有助于发展和繁荣优良的民族文化。

## (三)

蒙古民族有没有哲学和哲学史，对这个问题有人曾提出过怀疑。我以为对于这样的怀疑本身应当理解。蒙古这个民族虽然有较悠久的历史，也曾开放出自己的文化之花，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历史条件所加予它的贫困、屈辱，直到解放时为止，尚没有使它孕育出自己成熟的专业哲学家，没有哲学的讲坛，也没有系统的、专门的哲学经典，至少至今还未发现过这些方面的文字记录。当人们迫不及待地以这样的表象与别的先进民族相比时，发现蒙古民族并没有它的“亚里士多德”，它的“吕克昂”，它的《论灵魂》，也没有发现它有自己的程、朱学派、自己的“经学院”、自己的四书五经，因而持疑乃至不相信蒙古族有可资研究的哲学史，那或者是十分自然的，然而据我看，不妨从另外的或者说从哲学史本来的意义上去理解。什么是哲学史？

列宁曾经指出，哲学史“简单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依据这一公式，说蒙古哲学史，简单地说，就是蒙古人整个认识客观世界的历史，也许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事实上，蒙古人亦如任何别族的人一样，他们的历史活动也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对他们来说，也有意识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也有认识过程的产生、发展；也有由感性到理性再到实践认识的能动飞跃；也有特定时期的特定思潮对另一特定时期特定思潮的继承、演化的历史。怎么可以忽视这样的历史过程呢？不能设想，列宁的上述定义不适用于蒙古历史。

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蒙古族哲学史也是蒙古族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的产物。蒙古民族从进入阶级社会之时起，其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乃至统治阶级内部，就不断地进行争夺阶级利益的阶级斗争。为了战胜对方，各阶级在使用一切必要的政治、

经济、军事手段的同时，还百般地寻找和制造思想的或理论的武器。哲学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的斗争，正是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也正是作为这种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出现的。可以说，一部阶级斗争史也就是一部哲学斗争史。

事实上，蒙古民族也不是没有可供哲学家借以研究的文献的。自然，还没有现代意义的哲学史“教程”，没有这样的讲义和编年史，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可笑的。当一些古文明民族以丰富的文字记录贡献于人类的时候，它们早期的著录中也未必有专门的哲学典籍。正如很多哲学家同时就是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宗教家一样，不少典籍是哲学撰述，同时也是政治、军事、语言、文学、宗教以及医药等等的读物。蒙古民族的状况亦颇类似，很多形诸文字的创作，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的、军事的、宗教的和哲学的记录。其所以出现这种景况，除了诸多原因之外，最为主要的是与蒙古民族直到解放为止，始终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不成熟，科学技术不发达，社会及科学分工不清晰有密切的关联。恩格斯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社会尚且如此，前资本主义状况不是可以举一隅而反三吗？然而哲学理论的不成熟不能等同于不可能研究，更不能等同于没有。人们应当知道，在蒙古的早期著录中，一些哲学范畴已被闪烁地提出。在成吉思汗时代，已经提出了善与恶、天与命，人生的最高理想与世界的演变等问题，在其后的年代里，亦有不少理论观点萌芽，遗憾的是以往缺少这样的研究。

#### （四）

蒙古族哲学史从哲学这个角度看，与任何（一般的）民族的哲学史的规律、概念等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与一般哲学史有其一

致性。然而从蒙古这个民族看，它也还是应当有自己的特点和具体情况的。从一般中看它的特点，从特殊中找它的普遍性，我认为，这不妨可以当作在蒙古哲学史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

对蒙古族哲学史的研究，不宜离开蒙古民族历史的发展，哲学史的历史分期固然要尽可能适应整个蒙古历史的分期，而哲学思想的演化亦无需脱离整个蒙古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形势的发展，尽管二者不能简单地等同起来。在我看来，以下几点或可权作蒙古哲学史研究中不应忽视的参考线索：

(1) 需要研究前代。蒙古民族并不是突兀出现于蒙古地方的。在它以前，依次上溯，曾有女真、契丹、回纥、突厥、柔然、鲜卑和匈奴。他们长期在这一地区活动的结果，不但为后世留下了可资凭用的物质财富，而且也有一定的精神遗产可供后世接纳。蒙古族作为它们的集大成者，不可能不受这些前辈们所创造的条件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sup>⑤</sup>又说：“我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sup>⑥</sup>据此，研究前代的那些“前提”和“遗产”，乃是研究蒙古哲学史所必不可少的步骤。不研究这些，不但将导致无法理清蒙古哲学史的始源与传统性，而且会影响到对蒙古哲学史发展的特点与程度的探索。因此，蒙古哲学史除了在时序上要溯及从匈奴以后的整个历史年代外，在内容上也应概括上述各个民族的有关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讲，说蒙古民族哲学史也意味着蒙古地方历代游牧民族的哲学史，也不无理由。

(2) 不能忽视四境各族思想的影响。蒙古民族的历史活

动，从来不是孤立的。随着它的兴起、发展与衰落，它与四邻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变化，而其中与长城以里的民族的关系尤其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匈奴时代开始，中原文化就已经溢出北方关塞而播种于蒙古高原，其影响所及，历千年而不绝。游牧人学习内地文化，派子弟到内地留学；而汉人出边，汉书译为蒙文的亦有不少。这种长久的文化交流，既包括各种文化知识，又包括不同的哲学思想。而所谓“儒”家思想在这种文化交流中尤显得分外出色，至少它在历代各游牧民族的统治层中具有重大影响。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些民主主义思想之进入蒙古，汉地和汉族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源地和媒介。这样的思想一旦深入蒙古，与其他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能动的影响，并构成了蒙古哲学思想史不可缺少的部分。这是无可否认的史实。但是，这种思想为什么能够深入历代各游牧民族，它是以怎样的形式出现而又表现了怎样的特点，又是怎样见诸实践以发挥其对基础的反作用的呢？长期以来，对这问题不曾在学术界作过很好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应当成为蒙古族哲学史的一个篇章。

自然，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蒙古人也接触了科学的哲学思想，而随着日本“满蒙”政策的推行，法西斯主义哲学也曾浸淫于蒙古地区并曾发生了作用。对于这样一些历史现象，也不应排除在蒙古哲学史的研究范围之外，当然不能夸张这种影响。

（3）恩格斯曾说：“东方的历史表现为各种宗教的历史。”<sup>⑦</sup>这是一个极大的启示。宗教，主要是佛教（喇嘛教）在蒙古高原具有悠久的弘通经历。柔然时代，蒙古高原已有了佛徒的“伽兰”。其后，尽管民族有衰替，而北方统治者之扶持佛教，不曾稍歇。自元及明约三百年间，红教曾是主要的教派，明末以后，黄教风靡蒙古。恩格斯说：“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

学中的科目。”<sup>⑧</sup> 这话恐怕也适用于蒙古。喇嘛教的统治者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并与蒙古的封建统治者勾结在一起，以宗教鸦片大肆毒化蒙古民族。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宗教哲学成了统治哲学。自清末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论蒙古民族的社会、政治制度有过多么大的变化，这种宗教“鸦片”、寺院、教主及其思想影响却无几许根本变化。在欧洲，“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sup>⑨</sup> 这种情况对于蒙古似乎不很适用，内蒙古即使兴起“启蒙”运动，对于宗教及其哲学也不曾毁及它的皮毛。蒙古民族之所以“有下降的时期”，除了种种原因外，没有从宗教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是一不容轻视的因素。然而宗教为什么能在蒙古普及，它以一种怎样的思想手法败坏人们的世界观等等，至今尚需作科学的剖析。绝不能低估宗教对于蒙古的反动作用。

(4) “每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哪怕是不大发展的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的和被剥削的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地要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sup>⑩</sup> 蒙古哲学史就是要发掘和总结这样的思想体系，使它发扬光大。这样的思想存在于历史、文学著录中，也大量地散布在蒙古的《伊索寓言》中，存在于巴拉根仓的笑话中。

历史的问题要历史地看。从十七世纪到解放时止，蒙古民族总的历史命运是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大民族主义的压迫。这种压迫实际产生了反抗和妥协的实际，而“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斗争，无条件地是正确的。”<sup>⑪</sup> 一切反抗压迫的思想都是正确的思想，一切妥协的、投降的思想都是唯心主义的思想。民族意识在那时是可以肯定的精神力量。恩格斯曾针对德国的情况指出：“大宗钱财就是这样年年从德国流入罗马；由此而增的重压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僧侣的憎恨，而且激发了民族意识，特别是激起了贵族们的民族意识，……”<sup>⑫</sup>。在这里，“民

族意识”甚至是贵族们的民族意识，也是被当作“重压”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蒙古贵族很少有什么蒙古民族意识，然而他们中间的分化分子所具有的旨在反抗“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的“民族意识”，不必骤作贬词。

(5) 近、现代思潮的研究，应在蒙古哲学史的研究中给予更大的比重。20世纪初，特别是从“五四”运动开始，内蒙古民族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换期，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人民的困苦累加，而人们的社会或政治思想亦日趋复杂。当代的世界怎么样，蒙古的出路又如何，亦如政治领域的斗争一样，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是有哲学派别之分的。对于这些斗争应加以研究。

随着整个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蒙古族人民，首先是农业区的人民的政治觉悟日趋提高，城乡知识分子在接受与传播先进的、革命的理论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每一次全国的革命浪潮中，蒙古族的知识分子都深入群众，实践着他们的进步思想，而每一次这种实践也就是革命思潮的大普及。这种普及为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不少这方面的先行者，在蒙古的思想斗争史中应占有地位。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sup>⑬</sup>对近代、现代史，包括文化史（其中也有哲学思想史）缺乏研究的这种状况，无疑地体现在蒙古史的研究上，这是应当补正的。

建国以后的三十年是内蒙古历史的新时期，反映在蒙古哲学史上则应当列为新的篇章。经过十年浩劫，人们开始在思想上提出：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究竟对不对？为什么对或不对？关于前者，展开了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大大解放了人们被禁锢的脑筋；关于后者，中央又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正确认识三十年作了精辟的阐述。毫无疑问，蒙古族哲学史学界正需要根据中央决议的精神，逐步提出和探索

这一时期实际存在的哲学问题和理论问题，以使哲学史的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实践服务，使蒙古族哲学史的内容更加丰富起来。

（6）毛泽东同志曾说：“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sup>⑭</sup>这里既说了时限，又说了办法，这个指示当然也适用于蒙古族哲学史的研究，就是说，对蒙古族的历史，也要从古代到近代，在理论上（哲学思想上）给以“总结”，即从历史真实出发，从大量的实际资料的分析中，给以马克思主义的归纳，找出规律，吸取经验，而不能只津津乐道于哲学概念的解释，空洞的、抽象的理论争辩和用蒙古族以外的情况作不见得妥当的比拟、搬套。为此，除不断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武装我们自己外，加深蒙古族历史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成吉思汗曾宣示他的“素志”说：“我登阿尔泰山以望己营，我军之多如林，从军之女，亦可成队。我愿其口饴甘肥，身履文绣，居得华屋，牧得腴地，道途之内，荆棘不生。”<sup>⑮</sup>他一生的实践是否真的对此作了证明，可以研究，然而这些话本身却表明了他的人生观。以后，他又“教戒”后代：“但知鲜衣美食，乘骏马，拥娇姬。则将忘我等开创之功。”<sup>⑯</sup>在这里，他提出了他的历史预见，其后的历史经历真的证实了他的这个预见。他死后没多久，所谓“大汗国”即开始一步步分裂，他所“开创”的功业不断地萎缩，仅能自护，尔后自保亦不得，竟致沦替，终至屈膝向别族统治者“上书”，尊之为蒙古大汗。回溯蒙古以前历史，给人以这样的印象：17世纪以前，这个民族已在走“下坡路”，长期的军事行动招致了自身的苦累，然似乎尚有这点进取精神，而从那以后，则走到了坡底，社会风气几乎一派颓唐。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自然很多，历史学家们尽可以全面研究，然而就社会思想这个角度看，哲学理论界的任务，恐怕就义不容辞了。马

克思曾说：“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sup>①7</sup>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哲学史破除对蒙古历史的“迷信”，这是一项了不起的繁重而艰苦的工作。它甚至是超过了“启蒙”这个意义的。

## （五）

党的六中全会号召：“要在全党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蒙古族哲学史的研究应视为是党中央这一号召的具体实施，我想，这是很光荣的。

蒙古族哲学史，作为史事早就存在，是一个老问题，然而就人们对它所进行的工作来看，却是一个新问题。无论就全体规模或就其局部分析来看，过去都没有认真探究过，既没有来得及积累资料，也没有相应地总结过经验，一切免不了要从头做起。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文中说：“一切事的开头总是困难的。这一句话，在一切科学上都可以适用。”所以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们都可能已做了克服困难的精神准备，我看，这是唯物主义的。就是要用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态度研究蒙古族哲学史。

研究的规划总是需要的，因为总要有个战略性的考虑，以便安排力量，确定办法，具体人手。对于集体或个人，这一步恐怕均不得免。对于个人来说，当然更应有具体的实施方案。冒然地说，蒙古这一民族似乎并没有什么哲学“经典”，然而如果把所谓“经典”理解为文字记录的文化遗产，则“经典”还应当承认是有的，问题不过是或散或佚罢了。清人讲：“经学”，无论主实证，讲义理大概都注重三件事：辑佚、校勘、训诂。我们现在攻治蒙古哲学史，似乎也要走这一步。这虽还不便认定就是在攻治哲学史，但却是它的前提。因为这是资料，是研究的对象，

无此或有此而不真、不全、不清，研究是无从谈起的。所以我想，把资料工作放在首位更好一些。

自然，在资料完备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并努力写出作品来，这也是大家的期望，孔夫子不得已而著述的态度，不是今天应当学习的态度。但是，在草创时期，也不必急于求成、求大，能在一个方面，一个专题上狠下功夫，取得进展也是可喜的，应当鼓励这样的努力。

正如很多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工作一样，蒙古族哲学史的研究也是一种首创性的劳动。这里不仅需要细心，也需要大胆。畏首畏尾，守默守雌，自设禁区，云人所云，是无法有所发明的。马克思曾说过：“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sup>⑧</sup>在对蒙古族哲学史的研究中，我想，应当有这样的精神。这种精神有助于解放思想，无碍于打破老框子。

内蒙古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会成立了，这是一件好事。它标志了内蒙古学术界新阶段的开始。在研究会的组织和推动下，蒙古哲学史坛必将盛开绚丽之花，为祖国的学术园地增添光彩。

#### 注释：

- ① 《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1页，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399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0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1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77—47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255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5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